

对  
二  
十  
世  
纪  
社  
会  
主  
义  
资  
本  
主  
义  
及  
其  
关  
系  
的  
反  
思

在行将逝去的20世纪里,无论中国还是世界,无论经济还是政治,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发生了以往一切世纪所没有过的巨大变化。就社会发展而言,20世纪唱主角的无疑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它们之间关系的阴晴圆缺是整个世界跌宕起伏的走向的主旋律,20世纪交响乐就是围绕着它逐步展开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主义”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构成20世纪这首交响乐的重要乐章。所以,反思20世纪中国发展道路选择的时候,必须要回过头再看一看中国人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认识,再想一想中国在这方面的实践。这样做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按邓小平的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才能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新世纪。

### 一、从钱广赶马车谈起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一类的词汇似乎注定是冷色调的,用轻松的口气来谈严肃的话题,从哪儿讲起呢?中国社会主义的曲折发展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曲折发展的一个缩影,也可以说是两制关系曲折发展的一个活标本。让我们就从中国曾经发生过的和正在发生的事例中来说明弄懂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重要意义,说明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关系有多么重要。

大约是在70年代初期,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青松岭》。故事发生在某省一个叫青松岭的小山村。车把式钱广脑子比较活,一门心思想“发家致富”。所以,每逢赶车进城的时候,他总是把自己的和左邻右舍的茄子、辣椒等家种蔬菜以及土特产捎上一些,偷偷卖点钱。正因如此,他家的生活也小有改善,回来后时常与老婆对饮几杯。然而,钱广的这些做法引起村支书万山大叔等人的愤慨,矛盾由此产生。在万山大叔的眼中,钱广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因为他发展的是自家的小生产,他做的是自己的小买卖、小生意,他富的是自己的小家庭。更可恶的是,钱广还滥用车把式的“特权”并引诱一些社会主义“觉悟不高”的农民跟他学。总之,钱广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要复辟资本主义。于是,万山大叔先做那些跟着钱广跑、觉悟不高的群众的思想工作,用自己给地主赶车落下的“老寒腿”现身说法,告诫他们不要走回头路,免得“再受二遍苦、再遭二茬罪”;然后,他又带领觉悟了的群众同钱广进行斗争,经过批评教育,钱广痛改前非,重新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电影的情节并不复杂,但是将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它们之间的那种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是真正的结局呢?那是令人心酸的。这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完全是基于一种无知的、纯朴的、盲从的情感,而毫无深沉的、理智的思考(坦白地说,处于封闭状态的农民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电影是高于生活的艺术,但又确实实地来源于生活,《青松岭》就是当时中国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现实的缩影,甚至就是真实的写照。社会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好,在现实生活中都被人格化了。

孔寒冰

### 二、关于“宁长社会主义的草， 也不栽资本主义的苗”

这是流行于中国“史无前例”时代的一句著名的“豪言壮语”，相类似的话语，在铁路有“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也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在厂矿有“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也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它们所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仅是不兼容的，而且是绝对的、全方面的对立。

既然是绝对对立，那就应当彻底铲除资本主义，一点儿也不能留，于是在70年代初达到登峰造极时就出现了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和“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其基本理论根据是毛泽东在1974年作的一系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讲话。

10月20日，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毛泽东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了。”

12月26日在听取了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后，毛泽东对周恩来、王洪文等人说：“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现在实行的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这样，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物质利益、奖金、利润以及农村的个体小生产都属应加以限制并逐渐消灭的资本主义的范畴。在辽宁一个十分贫困的山区，生产队长率领着社员将路边一块一块个人种的谷子连根拔掉，由于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栽资本主义的苗”和“割资本主义尾巴”这样奇特的信念和决心支撑着，他们在毁坏这些眼看就要成熟的谷物时竟然毫无吝惜之情。这不是天方夜谭，而是笔者在25年前亲眼看到的一幕，时间虽然过去这么久了，可还是历历在目。

无独有偶。当时被誉为“欧洲一盏社会主义明灯”的阿尔巴尼亚，人口只有300多万，但“一手拿镐，一手拿枪”，在国土上建造了40多万座碉堡，其目的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外国人不准进入阿尔巴尼亚旅游观光，因为他们不是来自资本主义国家就是来自搞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美丽风光“绝不能出卖给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分子来享受”。

如此这般地兴社会主义、灭资本主义，如此这般地将它们对立起来，结果怎样呢？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在其根据20多年采访经历写成的《邓小平时代》一书中写道：“1978年，全国8亿农民每人年平均收入仅有76元，其中2亿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50元。当时农民年平均口粮不到300斤毛粮。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1978年，全国有1/3的地区生活水平不如50年代，有1/3的地区生活水平不如30年代。”农村这样，城镇呢？仅以住房为例，“建国初期，天津人均住房面积3.8平方米，1972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下降到3平方米。50年代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的临时住宅，一直住到80年代。”1978年时，全国人均住房面积只有3.6平方米，比1952年的4.5平方米还低。从1953年到1993年，中国实行了40年票证制度，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无一不凭票、不凭本。著名的思想家顾准60年代把这叫作“糊口经济”，著名的作家张贤亮则称之为“数字化生存”。

草肯定不能当饭吃，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的思维模式多么简单，多么肤浅！可这又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了社会主义在实践上出现曲折不是偶然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不是偶然的，中国进行改革开放更不是偶然的。

### 三、关于批判修正主义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以及负责阐述这些领导人思想的学者们告诉人民：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于是，不论是什么，只要戴上资本主义这顶帽子，就立即变得张牙舞爪起来，谁也不得接近。不过，应当看到，出现这种情况的基本前提就是封闭。钱广从暗地小本经营中尝到了甜头，所以发家致富即便再邪恶，他也要搞，毕竟粮食不管是哪个“主义”的，都可以填饱肚子。所以，在社会主义世界，总有个别国家；在每个社会

主义国家,总有个别人“偷吃禁果”,想借用一下已被事实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具体运作手段以便或者摆脱困境,或者快点发展自己。这种有悖于当时“主流”的行为被斥之为修正主义,不仅被革除教门,甚至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批判修正主义是当代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中国1957~1977年二十年间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最先受批判的是南斯拉夫。60年代,中苏两党论战时,中国共产党曾发表文章称南斯拉夫为“现代修正主义”。所列举的理由,一是对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不是采取改造和消灭的政策,相反实行培植和发展私人经济的做法;二是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租赁、自由雇工和自由贸易,使得资本主义在农村大肆泛滥;三是取消了国家统一的计划经济,把利润作为刺激企业生产经营的根本手段,鼓励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把银行信贷作为竞争的杠杆,结果将社会主义全民经济蜕变为资本主义的私有经济;四是接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援助,与它们发展经贸往来,开放市场和放弃国家对外贸的垄断,这样南斯拉夫就成了帝国主义的附庸。

然后批判苏共和赫鲁晓夫。说苏共及其领导人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原因,一是他们主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长期和平共处,战争也可以防止;二是他们认为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已经淡化,国家和共产党都成为全体人民的了;三是他们反对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四是在经济生活中,他们强调利润、物质刺激和竞争等等。

最后是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他们在中国推行“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罪状是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唯生产力论”。

批判本来的含义指的是对事物的分析和研究、做出评判,以说明其优点和不足。可是,这里的批判早已变质,成为对异己的声讨和谴责,目的除了以人多势众的方法来证明被批判者的错误与可恶,还在于追求一种心理上的快感,用“大观园里的丫环穿得再好,也是奴才”这种精神胜利法来自慰。同时,批判还有“杀鸡给猴看”的功能,以警示对此六根没净、尘缘未绝者,不要想入非非。

当然,被批判者也是批判者的参照物,是批判者常常用来照自己的一面镜子。以史为鉴、以人为鉴,这是古训,理应遵从。可问题是,由于什么是社

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没有搞清,“修正主义”这面镜子实际上成了一片哈哈镜。在它面前,歪曲的必然是照镜子者自己。胖子一照就成了瘦子,高个子一照就成了矮子,于是胖子忙不迭地增加体重,瘦子则慌慌张张地去减肥。所以,社会主义也就越发展越畸型,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就是这种畸型发展的必然结果。

#### 四、两制关系的调整 —— 改革开放的实质

上面讲的都是“忆苦”,我们还可以“思甜”。

国内外都公认这样一个事实:自1978年起,中国的命运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其标志就是这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可以从许多角度来分析、研究改革开放,但就实质而言,改革开放就是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三个层次关系的再认识、再调整,将它们由过去的冤家对头变成了合作伙伴,由纵向替代变成了横向并存。还是用一些经济上的“第一”例子来说明吧!

先看改革。

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自发签订了全国第一份大包干合同书(“包干”、“合同”以前是姓资的);

1980年6月18日,上海静安区工商局批准陈贵根开办了“文革”结束后第一家私营饭店(“私营”以前是姓资的);

1984年,马胜利承包了石家庄造纸厂,成为全国第一个承包国营企业的人(“承包”以前是姓资的);

1984年9月,中国第一个股份制公司——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股份制”以前是姓资的);

1985年1月14日,上海职工谢海清购得“延中”股票50股,成为中国第一个股民(“股票”、“股民”以前是姓资的);

1986年8月3日,沈阳防爆器械厂成为全国第一个宣布破产的企业(“破产”以前是姓资的);

1987年10月,中国第一个股份制企业集团——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企业集团”前是姓资的);

1990年11月26日,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在

## 主题论坛

上海成立(“证券交易所”以前是姓资的);

1992年10月8日,中国第一家国际商品期货交易公司在上海成立(“期货交易”以前是姓资的)。

……

太多太多这样的第一,如今都已融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在吸收的同时,一些以前绝对是姓社的经济范畴,如单一的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票证制度、平均主义的“大锅饭”、“铁饭碗”、福利分房、公费医疗等等,都已经或正在被改掉。

吸收的、抛弃的以及在此之后所形成的,不就是作为两制关系调整结果的改革吗?

再看开放。

1979年7月,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企业法》就像一把金钥匙,打开了对世界封闭了近30年的国门,也打破了“一无内债,二无外债”陈腐思想的禁区,昔日“夹着尾巴逃跑了”的“帝国主义分子”和“资本家”又纷纷夹着装有美元的皮包回到中国大陆,但这回不再是肆意的侵略,而是友好的投资。可以这样讲,中国20年改革开放这首交响乐是围绕着利用外资、建立涉外企业这个主旋律开展的。前外经贸部长吴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总结说:“从1979年到1997年11月底,我国已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302464家,合同金额5134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2166亿美元。已经开业投产的企业超过14.5万家,直接从业人员1750万人。1996年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13280亿元人民币,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92年的7.09%提高到13.33%。外商在华投资企业为我国增加了财政收入,提供了就业机会,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和经济增长点,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牵动力之一。”根据最新的资料,“截止到1999年5月底,全国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331024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13.56亿美元。”

外资除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外,还是促进中国体制转轨的催化剂、实现国家统一的纽带和走向世界的桥梁。中国已离不开外资了(当然,外资也需要中国)。据专家测算,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中至少有两个百分点是外资拉动的。然而,不要忘记,几乎所有的外资都是姓资的,即来自资本

主义国家和地区。在每一笔外资、每一家涉外企业的背后,不正是中国与外国、大陆与港澳台之间的关系吗?不也是两制关系调整的结果吗?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全方位的以经济为重点的外交活动中,才有中美“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中俄“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中日“面向21世纪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中英“合作伙伴关系”、中法“全面伙伴关系”等等。

一球两制,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共有一个地球,相互依存,齐谋发展,这就是当今的世界格局。

所有这些,又从正面说明,正确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应当会有怎样的积极结果。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不正是这种积极成果吗?

### 五、从现代的视角对两制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的反思与批判

上面未加详细分析、论证的例子无非是要说明,正确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以及正确处理它们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也许有人会说,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而今谁还讲这些呢。

其实不然,树欲静而风不止,更何况思想也好、体制也好都有很大的历史惯性。还有,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并非只是积极效应,负面效应也是明摆着的。比如,大量的外资和众多的涉外企业对国内企业、国内市场和国有品牌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于是就引起了近几年关于引进外资是好事还是坏事,引进外资是多了还是少了,是中国利用外资还是外资利用中国,对外开放到底是招来凤凰还是引狼入室等一系列争论。

在中国这个意识形态传统浓厚的国度里,任何争论的不同结局都会给社会发展带来不同的结果。

在有的情况下,争论的各方对争论的对象并不清楚,属于“无的放矢”,比如前面谈到的“资本主义复辟”问题。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在社会剧烈变动的转轨时期,争论属于新旧思想的交锋。社会的进步首先是从思想解放开始的。

中国正处在从传统的体制向一种新的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新旧思想交锋的焦点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所谓姓资姓社问题。

(下转第31页)

## 主题论坛

“第三条道路”辩论中的混乱现象,与上述“第三条道路”自身的混沌状况有着直接的关系。可在国内有关“第三条道路”的讨论中出现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它也许与我们过去的哲学熏陶有关。我们常常习惯于对一些事物作“定性”分析,有人甚至在还没有弄清“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们究竟在说些什么做些什么的时候,就急于给它定性、下断言。这种做法,客观上对“第三条道路”辩论中的混乱现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客观地讲,“第三条道路”显示了欧美国家“新一代”领导人在寻求适应时代变化的新政治过程中的理论探索。从布莱尔、克林顿到施罗德,在他们关于“第三条道路”的演说背后,有许多有影响的理论家和思想库在认真地思考和论证。这些理论家、

思想库对传统政治理念的更新,对时代新问题的剖析,对福利国家改革的新思路和新政策,都体现了他们在适应世界的变化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许多问题不只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同时也是整个世界,包括我们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听听他们在说些什么,在做些什么,对我们无疑是有益的,而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它的理性批判。

“第三条道路”正处于实践过程中,它的理论及实际意义都有待实践的展示和丰富,人们对它的评说尚限于目前的发展状况而很难有什么定论。尽管如此,对它的全面研究,有助于我们对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对人类 21 世纪即将面临的各种新问题的深层思索。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编译局。

(上接第 15 页)

两制关系问题不搞清楚,势必影响中国的转轨进程。

如何才能深刻地认清今天和明确地展望明天呢?或者说使正确的观点在争论中获胜并在实践中成为指南呢?必须正确地总结昨天。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关系的理论和实践上,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太多太多的经验和教训,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这些经验和教训也不能不算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然而,总结过去必须站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的高度,目的也必须是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总之,必须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如果仅仅是重复、赞美某些理论并用它们来指责现在,如果仅仅是沉溺在某个时期的历史辉煌中并用它们来对比现在,那么,这样的总结比不总结差不了多少。

总结必须是反思的,即从自身找出成功与失败的原因、经验和教训。为什么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会出现今天看来几乎不可思议的过程?其深刻的思想上的、历史上的、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原因在哪儿呢?对这些再作进一步的理论分析非本文所能容纳,这里就暂且不谈了。但要指出的是,千万别光强调外因,千万别忘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就是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总结还必须是批判(哲学意义上的),对已有的理论和实践作出自己的判断,说明它们正确在哪

儿,错误在哪儿以及为什么正确或不正确,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来真正发展某一种理论或推动某一种实践。

总结、反思、批判就是照镜子、整衣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关系这面历史镜子必须是干干净净的,这样照过并整理后的社会主义形象才能是整整齐齐的,才能以饱满的热情、无限的生机走向 21 世纪,以图再度辉煌。

我们应把总结当作抹布,以去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关系这面历史镜子上的各种污渍为使命。但是,也许有的污渍太久了擦不掉,也许这片抹布本身也有不干净的地方,但无论如何总会有些功效的。对此,我毫不怀疑。

注释:

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文化大革命”时期)》(27)第 221 页。

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上卷第 18 页,22 页。

参见《厂长经理报》1998 年 12 月 5 日。

李争平:《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外经贸部部长吴仪访谈录》,《经济日报》1998 年 1 月 20 日。

《人民日报》1999 年 6 月 25 日。

[作者简介]孔寒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博士。